

【考古学史】

近代俄国和德国 在吐鲁番考古领域的合作与冲突

郑丽颖 (俄)米哈伊尔·德米特里耶维奇·布哈林

【摘要】本文根据俄罗斯科学院档案馆新近公布的俄国考古学家奥登堡、克莱门茨与德国探险家格伦威德尔的书信档案,结合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史料,详细梳理了俄德新疆考察队的短暂合作、考古范围的划分、冲突原因及结果。本文认为乌鲁木齐领事馆医生科哈诺夫斯基的吐鲁番考古是双方冲突的导火索,勒柯克考察队进入库车标志俄德冲突的加剧和合作的破灭。

【关键词】科哈诺夫斯基;奥登堡;格伦威德尔;勒柯克;新疆考古

【作者简介】郑丽颖,敦煌研究院敦煌学信息中心、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俄)米哈伊尔·德米特里耶维奇·布哈林,俄罗斯科学院。

【原文出处】《西域研究》(乌鲁木齐),2024.1.58~71

【基金项目】本文为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71批面上项目“俄藏喀什总领事彼得罗夫斯基信札档案整理与考释”(项目编号:2022M710695);中国敦煌石窟保护基金会项目“俄藏奥登堡敦煌考察档案的数字化”阶段性成果。

关于俄德亚洲考察队研究已取得了诸多重要成果,有些文章中也提到了他们的合作及冲突,^①但依然存在缺乏细致的问题研究、冲突始末、细节彰显不够等问题。研究俄德考察队冲突的主要问题是史料的缺乏,史料不足导致无法揭示细节。2020年,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档案馆和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公布了德国探险家格伦威德尔和俄国委员会主席拉德洛夫、探险家奥登堡、克莱门茨的信函,俄德两国委员会主席拉德洛夫和皮歇尔的书信档案,笔者从档案资料中捕获了一些新内容,可以更好地揭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两国考察队的合作、冲突及其相关细节。

一、俄德考察队对吐鲁番的觊觎

19世纪下半叶,俄国先后征服浩罕、布哈拉、希瓦的同时加紧对中国新疆的侵略,1881-1884年,中俄《伊犁条约》等5个勘界议定书的签订,为俄国在亚洲开展考察活动提供了基础和条件。在俄国皇家地理协会和俄国皇家考古协会东方部的主导下,俄国

派出大量考察团到中国新疆和西藏进行“考察”活动。1858-1859年瓦里汉诺夫完成了喀什噶尔考察,^②1856-1888年谢苗诺夫·天山斯基完成了三次天山考察和外里海考察,^③1865-1868年的塞维尔措夫完成了天山考察,^④1870-1873年,普尔热瓦尔斯基完成了首次中亚考察,^⑤1876-1877年完成罗布泊考察,^⑥1879-1885年,普氏与罗伯罗夫斯基共同完成两次西藏考察,^⑦1893-1895年罗伯罗夫斯基完成中亚考察,^⑧1876-1899年波塔宁的新疆考察^⑨和中国西藏、甘肃考察^⑩、四川考察^⑪,1878-1879年,俄国人植物学家雷德尔最早进入吐鲁番采集植物,在高昌故城发现了佛像残片等文物。此后奥布鲁切夫带队完成1892-1894年中亚考察,^⑫1876-1877年,别夫佐夫完成准噶尔考察,^⑬1889-1890年完成西藏考察,^⑭1888-1890年格罗姆切夫斯基完成帕米尔考察。^⑮上述活动奠定了俄国在新疆、西藏活动的基础,他们带走数以万计手稿资料,涉及地理、历史、语言、文化、生物、军事等各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俄国对新疆考

古研究的热度远高于其他地区。19世纪90年代,俄国驻喀什噶尔领事彼得罗夫斯基与俄国皇家考古协会东方部建立了所谓的学术联系,此后15年间,东方部主席罗曾公爵(1849-1908)^①源源不断收到来自中国新疆喀什噶尔的手稿和佛教艺术品,寄件人正是彼得罗夫斯基。

1890年初,英国军官鲍尔在库车获得一张书写在白桦树皮上的婆罗米字母书写的梵文佛教手稿,引起了竞争对手俄国考古协会的恐慌,成为俄国自上而下系统开展新疆考古研究的催化剂。基于谢苗诺夫·天山斯基、普尔热瓦茨基、罗伯罗夫斯基、波塔宁、克莱门茨、科兹洛夫、彼得罗夫斯基的考察成果,以俄国人类学和民族学博物馆馆长拉德洛夫为首的东方学家决定对吐鲁番文书手稿进行地毯式搜索,并联名向俄国科学院提出组织考察队完成“吐峪沟麻扎、高昌故城、吐鲁番等地考察”的申请。^②克莱门茨考察队应运而生。1898年5~12月,克莱门茨考察队完成了对吐鲁番古代遗迹的考察并带回不同语言书写的古代手稿。俄国皇家考古协会东方部极力希望克莱门茨吐鲁番考察队得以继续并向财政部提出了再赴吐鲁番考察的申请。俄国学者认为他们首先发现了吐鲁番遗珍,因此保有对塔里木盆地考察的“绝对权威”,“俄国学者对中亚和新疆研究就如法国对北非的研究、英国对印度的研究、德国对东非的研究一样重要。”^③皇家考古协会东方部计划以吐鲁番为中心,组织两支考察队分别对“吐鲁番及其以西,从托克逊经库尔勒到库车,再到中俄边境的广大地区”和“吐鲁番或托克逊出发直达罗布泊的广大地区”进行考察。^④第一支由5名成员组成,用8~10个月时间完成吐鲁番和库车考察,预算12900卢布。第二支考察队主要研究吐鲁番经罗布泊到和田的广大地区,考察队成员5人,用12~15月时间完成考察任务,预算17000卢布。然而,因政治因素等原因,东方部未能获得政府经费支持。1900年10月26日,东方部主席罗曾公爵在内部会议上遗憾地宣布:“财政部无法提供组建吐鲁番考察队所需经费。”^⑤

1899年,在罗马举办的第十二届东方学国际会议上,俄国公布了克莱门茨1898年在中国新疆关于佛教文明的考古发现,引起了欧洲学界的关注。俄

国随即提出了成立国际中亚东亚考察协会,这一提议最终于1902年9月在德国汉堡召开第十三届国际东方学会议时得以通过,会议正式将新疆考察列入工作议程。新疆俨然成为欧洲考察队眼中的一块肥肉。1903年2月,俄国中亚东亚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民族学考察委员会(简称“俄国委员会”)成立,成为外交部直属特设机构。1903-1907年,俄国委员会在《委员会公报》陆续刊登了国际中亚东亚考察协会章程、俄国委员会章程、匈牙利委员会章程、法国委员会章程和意大利委员会章程。^⑥德国也成立了类似机构,全称为“德国吐鲁番委员会”,主席系印度学家理查德·皮歇尔,^⑦他的得力助手格伦威德尔三次到访吐鲁番并劫走大量珍贵佛像壁画。

俄国委员会成立后继续为促进吐鲁番考察而争取经费。然而因“政治复杂”等原因财政部拒绝拨付考察费用。1902年7月1日,罗曾给奥登堡的信中谈到了吐鲁番考察经费再次落空:

我在办公桌上发现财政部^⑧部长以阿芙古斯杰申^⑨名义签发的文件,他说“尽管很理解我们,1903年也不会有经费支持,请我们推迟对塔里木盆地考察计划,等待更有利的时机”。文件落款日期是6月20日。原因:政治形势复杂。

奥登堡并没有因此丧失信心,1903年6月1日,他给罗曾的信中写到:当前需要确定到底去不去吐鲁番。1904年6月28日,奥登堡和驻乌鲁木齐领事科洛特科夫沟通后明确写到:“库车考察是可以实现的,我有科洛科洛夫,他确认没有危险。我还在等彼得罗夫斯基的回复。”^⑩如果说1902年夏俄国委员会的笼统范围是塔里木盆地,那么到1903年夏已严格确定为库车。1903年9月,俄国委员会决定到吐鲁番和库车考察。1903年年底,俄国委员会终于得到了财政部的经费支持。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档案馆新近公布的俄国委员会主席拉德洛夫和德国吐鲁番委员会主席皮歇尔的书信证实了这一点:

尊敬的教授先生:

当从阁下的信中得知柏林也建立了国际协会分会后,我感到非常欣慰。很早就谈到过,为了科学事业,我们(俄国委员会)制定了很多重要的计划。希望您的计划顺利进行。我们目前处

在和您一样的状态:和政府争取赴新疆考察的经费支持。9月份召开的委员会会议通过了派考察队赴吐鲁番和库车考察的决议,时间定在和格伦威德尔先生谈判之后。关于双方考察计划的重合部分,我没办法用语言表述:那片土地如此之广阔,成百上千的古代手稿等待我们去研究,而这一切,早在很多年前很多探险队就已经知道了。双方考察队需要作很多准备,最好格伦威德尔先生和奥登堡就双方的考察地区作一次交流和会话。您需要的那份公报,我寄给您了。第三期正在准备中,计划刊登我们“朴素科研事业”的成果。政府会因此拨付考察费用,我们很快就能在俄国区域内开始这项伟大的事业了。

最诚挚的祝福

拉德洛夫

1903年12月22日至1904年1月4日^⑤

拉德洛夫在信中向德国吐鲁番委员会透露了计划对吐鲁番和库车进行考察等重要信息。关于克莱门茨的吐鲁番和库车考察经费来源,奥登堡激动地谈到:“在俄国委员会的经费支持下,克莱门茨将完成他未竟的科研事业,将吐鲁番地区的佛教遗珍、摩尼教遗珍和聂斯托利遗珍带回俄国博物馆。”^⑥拉德洛夫提到的俄国委员会“公报”,共发行70期(1903-1918年),全部保存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其中1904年1月4日前刊布的公报只有第一期,刊登了俄国委员会成立的背景、委员会主要成员、章程;第十二届和第十三届东方学国际会议纪要。与会的皮歇尔对上述内容早已熟识。笔者猜测皮歇尔“需要的公报”很有可能是1903年3月正式刊发的第二期,作为俄国委员会主席的拉德洛夫,在公报正式刊发前两个月完全可以拿到待刊。第二期的最后一篇是长达8页的《格伦威德尔新疆考察评论》^⑦,“评论”详细阐述了吐鲁番和库车的古代遗迹及其价值,这些信息对即将组织第二次吐鲁番考察团的皮歇尔而言至关重要。信尾“在俄国区域内”暗示拉德洛夫已基本同意双方划分考察范围、互不“侵犯”。俄方的“真诚”并没有换来德国人的信任,从格伦威德尔和老师库恩的信中可以看出,格伦威德尔时刻关注

着俄国考察队前期准备进程。1904年6月12日,格伦威德尔给库恩的信中写到:“三个俄国学者,有可能是别列佐夫斯基及其同行,将要去新疆考察。”^⑧尽管在这封信中格伦威德尔对俄国给予的协助表达了诚挚的谢意,接下来便直言暗地赶超俄国考察队的计划:“助手勒柯克应该在8月之前出发,经北京抵达吐鲁番,想要赶在俄国人前面,就不能让他们知道!”^⑨同时,格伦威德尔也担心没有俄国朋友的帮忙,德国考察队在吐鲁番的考察工作将步步受阻,甚至无法经俄国返回欧洲。^⑩1904年9月9日,格伦威德尔非常满意地写到:“因经费不足,俄国学者别列佐夫斯基和塞缪尔·马蒂洛维奇·杜丁^⑪哪儿也去不成了。”^⑫1904年12月9日,格伦威德尔用一整段描述别列佐夫斯基^⑬的考察计划和考察耽搁的原因,^⑭1900-1902年,俄国委员会还在为考察经费发愁时,1902年底德国人已经开始在高昌故城进行考古挖掘了。

二、俄国委员会对德国皇家普鲁士考察队的协助及双方考察范围的划分

1902年8月至1903年3月,格伦威德尔带队完成了皇家普鲁士首次吐鲁番考察(ПИТЭ),^⑮俄国委员会在入境、通行、挖掘、古文书运输等方面给予德国考察队全方位协助。格伦威德尔在信中(第21号)向拉德洛夫承认,没有俄国委员会主席的帮助,德国委员会不可能顺利完成吐鲁番考察,就算到了吐鲁番,也不可能把全部手稿带回柏林。^⑯

(一)俄国委员会对格伦威德尔的协助

第十二届国际东方学会议后,拉德洛夫给德国代表格伦威德尔的信中全盘托出克莱门茨的考察工作进程,甚至还产生过组建俄德考察队的想法。^⑰1902年1月7日,格伦威德尔因一直拿不到清政府入境许可而向俄国委员会寻求帮助,随后俄国外交部下发《驻迪化与喀什噶尔总领事引见德国探险队之信函》《俄国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主事致上述二处俄国总领事引见德国探险队之信函》《俄国圣彼得堡海关总署致驻维尔巴林与莫斯科海关机构负责人之指令,确保本探险队之一应行李因纯系过境物品将直接运抵中国领土故不受开封检查及享受关税豁免待遇》^⑱,德国考察队得以顺利从塔城入境,而后格伦威德尔从圣彼得堡拿到了清政府同意考察队挖掘的函

件。^④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和皇家博物馆分别保存着1902年5月10日和1902年9月20日格伦威德尔写给奥登堡的信札,明确写明伊宁总领事费多罗夫(С. А. Федоров)和乌鲁木齐新任领事科洛特科夫将全面协助格伦威德尔。俄国委员会对格伦威德尔考察活动及结果高度关注。1903年,俄国委员会会议纪要中写到:“我们决定向准备返程的格伦威德尔致以最真挚的问候,他目前正在喀什噶尔,即将带回丰硕的考察成果。”^⑤1903年7月24日,完成首次吐鲁番考察的格伦威德尔返回柏林后,给俄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彼得罗夫斯基去了感谢信:

尊敬的总领事先生:

我们已返回柏林,我和我的同事非常荣幸在喀什噶尔期间得到阁下热情的接待。今天我给您寄了三本书,再次感谢贵馆给予的协助。

格伦威德尔于柏林^⑥

在克莱门茨的提议下,委员会通过人类学和民族学博物馆委员会函告邮政总局解决了格伦威德尔考察期间通信不畅的问题。^⑦格伦威德尔从吐鲁番收集了57箱手稿和文物,文物经由俄属中亚运往柏林。俄国在通关和运输上为考察队提供了便利。1903年9月27日,俄国委员会会议纪要中再次谈到对德国吐鲁番考察队所获文书运输回国的协助:

主席函告税收司免查并放行格伦威德尔教授吐鲁番考察队的44箱文书文物,这批文物由中国经俄罗斯帝国运往德国柏林人类学皇家博物馆,历时3个月,同意此项申请。^⑧

两个月后,1903年11月20日,格伦威德尔在德国柏林郊区住所给俄国委员会主席拉德洛夫的信中第一行就谈到吐鲁番收集品已完整运抵柏林:

非常高兴告诉您,13+44箱,全部顺利运抵这里。我的心终于放下了,在第一时间给您写信感谢阁下的殷切关照。现在我面临大量的工作,完成这些需要几年的时间。目前需要完成的事务还很多,研究吐鲁番文物只能后面再说。现在迫切需要完成的是考察报告。^⑨

俄国委员会、俄国外交部先后解决了德国考察队入境、免检、免税、通行、挖掘、通讯、文物运输等问题,俄国“同事”的协助极大减轻了德国考察队的负

担。^⑩可以说,没有俄国委员会的协助,德国考察队不可能顺利到达吐鲁番、更不要说将57箱文物完整运回柏林。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俄罗斯科学院档案馆公布的书信证明德国考察队运抵柏林的文物是整整57箱,而不是46箱。^⑪1903年10月13日格伦威德尔给拉德洛夫的第6封信中就提到了带在身边的13箱文物,“因更为重要而一直带在身边”^⑫,直到安集延这13箱文物才交给邮局,先寄到圣彼得堡而后转运到柏林。另外44箱从吐鲁番由商队经塔城运到俄属中亚,经安集延运往欧洲。1904年9月,德国吐鲁番委员会启动第二次吐鲁番考察,勒柯克和巴图斯经圣彼得堡、西伯利亚大铁路进入新疆。入境许可同样由俄国委员会委托外交部代为办理。

(二)俄德关于考察范围的划分

德国首次吐鲁番考察刚刚圆满结束,格伦威德尔转即策划第二次吐鲁番考察,1903年11月20日,他给拉德洛夫的信中^⑬提到德国正在酝酿新一轮的考察。“关于尝试组织新一轮的考察,皮歇尔先生已经和您说过了。我希望可以在库车附近捕获些收集品,我亲眼所见摩尔图克流淌着金色的河流。”^⑭此时的俄国委员会也在为组建吐鲁番和库车两支考察队积极奔走。根据俄国委员会1904年3月22日会议纪要,“克莱门茨认为当前状况不允许他参加今年的考察,如果考察队可以组建的话,建议别氏任库车考察队队长,杜丁任吐鲁番考察队队长。”^⑮委员会采纳了克莱门茨的建议,别氏被确定为库车考察队队长,俄国委员会公报同步公布了吐鲁番和库车考察经费各为9000卢布的预算明细。可见,直到1904年春,俄国委员会仍有意组建吐鲁番考察队。而关于格伦威德尔提出的两国考察队的范围划分,俄国委员会主席拉德洛夫在1903年12月22日至1904年1月4日的回信中明确表示希望双方代表奥登堡和格伦威德尔见了面再谈。也就是说,到1903年底,俄德尚未确定考察范围划分的具体方案。1904年7月24日,格伦威德尔给拉德洛夫的信中提到准备赴圣彼得堡与俄国委员会就两国考察范围进行商谈。这封信很有可能是俄德委员会就确定考察范围准备面谈的首份书面档案。1904年8月22日,格伦威德尔给拉德洛夫的信中谈到,德国吐鲁番委员会确定组建第二次

吐鲁番考察队,考察队由德国文化部筹建,^③德皇和德国军火大王克虏伯(Friedrich Krupp)提供经费支持。^④格伦威德尔就考察范围所作考虑函告拉德洛夫并希望俄方作出让步:

尊敬的阁下:

……因身体原因,我不能参加这次考察。

委员会授权我告知阁下,本年秋季,也就是九月份,委员会将派出考察队,由德国文化部支持。博物馆研究员勒柯克和技术员巴图斯为主要成员。现请求将下述地区划分给我们:

高昌故城及以北到吐鲁番,轮台到胜金口的广大区域,木头沟留到明年我准备亲自去考察。

哈密绿洲。

库尔勒及其周边地区,轮台和胜金口也在考察范围内

勒柯克会在考察途中先到圣彼得堡,与您见面。

阿尔伯特·格伦威德尔

1904年8月22日于柏林^⑤

这是唯一一份关于双方考察范围的档案资料,现存于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档案馆。1904年8月22日,格伦威德尔代表德国吐鲁番委员会正式提出将库车以东直到吐鲁番,包括胜金口、木头沟、轮台的广大区域确定为德国1904-1905年的考察范围。德国希望以库车以东的吐鲁番为中心,考察范围包含高昌故城、哈密、库尔勒周边地区。因身体原因,格伦威德尔不能参加此轮考察,由勒柯克任队长。信中,格伦威德尔将流淌着金色河流的木头沟“预留”到明年亲自带队考察。格伦威德尔的工作报告中提到了“和圣彼得堡先生谈判”的结果,证实了1904年8月22日书信内容的真实性:

和圣彼得堡先生们谈判后确定了柏林考察队的范围是吐鲁番盆地到哈密,轮台及其周边地区,胜金口及其以南地区。这段区域对我们非常有利,考察范围很广泛,如果不仅限于搜罗古代手稿,这些地区够20支柏林考察队工作了。^⑥

格伦威德尔对精心划定的考察范围非常满意,这块区域(吐鲁番)藏有数量可观的手稿,格伦威德尔直言“这些地区够20支柏林考察队工作了”。1904

年10月至11月,格伦威德尔应邀访问了圣彼得堡,与奥登堡就两国考察队“工作范围”作了谈判。格伦威德尔的圣彼得堡访问报告中详细记录了访问过程和谈判内容。档案现存于格伦威德尔的吐鲁番收藏品档案,^⑦部分内容摘录如下:

首先,查列曼阁下、奥登堡教授和格里戈利耶夫博士带我到亚洲博物馆参观俄国外交官彼得罗夫斯基收藏品中的古代手稿和佛像,彼氏已退休离开了新疆。收藏品主要来自和田和库车,手稿主要是梵文写本(如用中亚婆罗米文书写的《妙法莲华经》),此外,还有一些不知名语言的古印度手稿。而后,在施杰恩别尔克先生的陪同下,参观了俄国皇家科学院博物馆,这里有克莱门茨从胜金口、吐峪沟麻扎、木头沟带回的壁画原件。在圣彼得堡期间,这些壁画还没来得及装裱。俄国先生向我展示了他带回的照片,他们允许我留下几张照片并授权我在德国公布,还参观了亚历山大三世博物馆,见到了馆长克莱门茨,他向我介绍了一些自己的收藏品。他们告诉我,柏林委员会(德国皇家吐鲁番委员会)可以把吐鲁番盆地作为研究范围,已经去过吐鲁番考察的俄国艺术家杜丁正在临摹一部分壁画,如果需要的话也可以带回柏林。但是直到访问结束,他们也再没提过杜丁的临摹品。我和别氏见了面,俄国委员会准备派他去库车考察。^⑧

1904年11月,格伦威德尔和俄国委员会主要领导在圣彼得堡正式达成协议,即德国的考察范围包括吐鲁番盆地到哈密、轮台及其周边地区,胜金口及其以南地区。1904年12月9日,克莱门茨给奥登堡的信中同样提到了关于两国划定考察范围的事实。1904年11月,俄国委员会已将考察重点从“吐鲁番和库车”转移到“库车”,委员会公报第4期刊登了库车考察经费预算和探险家波波夫(П. Попов)的库车考察笔记,详细记录了库车地理位置、周边城镇、交通、古代遗迹,从焉耆到库车的距离,途经村落等信息。^⑨1904年11月,俄国委员会会议研究决定俄国考古学家不去碰触吐鲁番盆地地区,^⑩考察范围仅限于库车地区。从下文格伦威德尔给库伦的信中不难

看出,德俄共享吐鲁番考察成果是俄国提出的唯一条件。

三、俄德考察队关于考察范围的纠纷及结果

1904年底至1905年初,俄德因考察范围互侵而产生争端,俄德委员会合作不足一月便破灭了。事件双方的主角分别是俄国委员会领导层奥登堡、拉德洛夫、克莱门茨、别氏和德国吐鲁番委员会的格伦威德尔和勒柯克。

(一)科哈诺夫斯基医生的吐鲁番考察是双方冲突的导火索

笔者在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档案馆公布的格伦威德尔与拉德洛夫、奥登堡书信中找不到俄德纠纷的原因,可见俄德委员会学者之间并未在信函中发生口角。随着俄罗斯科学院档案馆对档案史料不断规范化的整理,一些新的史料被陆续整理出来。笔者新近收到档案馆资深研究员布哈林院士发来的电子版信札档案中,夹杂着1904年12月9日克莱门茨给奥登堡的信函,恰巧对俄德纠纷细节作了说明,特为整理公布并解释如下:

尊敬的谢尔盖·费多洛维奇:早就该和您见面了,但一直没能见到您,只有写信汇报。所附信件说明了问题出在哪儿。看上去,很难和柏林人达成一致,甚至和他们保持体面的往来都难做到。准备离开乌鲁木齐的科哈诺夫斯基医生在信中问我,不知在科研方面能为我做些什么。我建议他收集吐鲁番的古代手稿的情报、拍些照片、收集壁画和手稿。但是这些都已经很难找到了。我一直在等他的消息,不知他找到了什么,或者打算做些什么。一直没有收到科哈诺夫斯基的信件,我甚至感觉,事情已经落空了。因此我没有将此事告诉委员会,没有任何意义。我向科哈诺夫斯基特别推荐了格伦威德尔忽视的交河故城,但也是徒劳。这座小城位于很难抵达的斜坡上,而河对岸连我都没有去过。那里的洞窟,也是很少有人知道。如果当地受过教育的居民了解情况,可以为我们收购一些有价值的(文物),连同彼得罗夫斯基所获珍品一同运往乌鲁木齐。

勒柯克的行为完全不值得我浪费笔墨。他

说有个什么划分范围的协议,就此我完全不知情。如果真有这样的协议存在,无论是柏林委员会还是圣彼得堡委员会也无法阻止别人对古代手稿感兴趣。除非他们包买或租赁了全部土地,谁又会同意这样的做法。我们因考古竞争产生的担心是多余的,吐鲁番的文物够整个欧洲工作100年。而那些想要和圣彼得堡委员会清算的国家是否想过,圣彼得堡委员会帮助他们,而不是阻碍他们完成考察任务该如何清算,这些是无论如何也算不清的。如果用勒柯克的思维方式考虑问题,谁都不要做研究了。

我感到筋疲力尽,周六离开这里恐怕不可能,您也知道,科哈诺夫斯基在等我的答复,我需要尽快让他知道事情的真相。

我没有和拉德洛夫、施杰恩别尔克提起过勒柯克,不想让他们因此焦虑。

您的克莱门茨

1904年12月9日^⑥

信函中提到的“谢尔盖·费多洛维奇”就是俄国委员会主要领导人奥登堡。科哈诺夫斯基全名科哈诺夫斯基·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Кохановский 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1904年至1906年任俄罗斯驻乌鲁木齐领事馆医生。^⑥信函内容透露了俄德合作关系破裂的直接原因。起因是克莱门茨建议科哈诺夫斯基到吐鲁番拍些照片,收集一些手稿和壁画,这引起了德国考察队勒柯克的强烈不满。根据俄德协议,德国考察队的活动范围是吐鲁番及其周边地区,俄国只能在库车活动。勒柯克将俄国人科哈诺夫斯基进入吐鲁番视为破坏了俄德协议。而关于协议,自1904年就到乌鲁木齐驻外的科哈诺夫斯基完全不知双方在圣彼得堡达成的协议。克莱门茨虽为俄国委员会成员,但对俄德委员会双方领导达成的协议嗤之以鼻。他认为无论是俄国还是德国,既然没有包买或租赁吐鲁番和库车的土地,就没有权利阻止他人踏上这片土地。而且,吐鲁番的文物数量之大,够整个欧洲研究一百年,无需担心手稿资源枯竭。对于勒柯克提出的和俄国人算账,克莱门茨气愤地质问,“委员会帮助了德国人,而不是阻碍他们完成考察,这该如何清算。”至于克莱门茨为何没有

向俄国委员会汇报,克莱门茨在信中也作了说明。因一直未收科哈诺夫斯基的回信,认为事情已落空,所以没有向委员会汇报。从这份书信档案可以清楚地看出,勒柯克认为乌鲁木齐领事馆医生科哈诺夫斯基进入吐鲁番地区考察破坏了双方关于考察范围的约定。这是双方发生纠纷的直接原因。

俄罗斯科学院档案馆新近公布的拉德洛夫 1905 年 2 月 6 日给德国吐鲁番委员会的官方回函对勒柯克提出质疑作了解释和答复。书信用德文书写,根据俄文译文整理公布如下:

译文(34号)

国际中亚东亚考察协会
俄国委员会

国际协会俄国委员会会员克莱门茨先生向俄国委员会转交了乌鲁木齐领事馆医生科哈诺夫斯基的信函,勒柯克告知科哈诺夫斯基,国际中亚东亚考察协会认定吐鲁番和库车之间应该是德国考察队的考察范围,也就是说当德国考察队在此范围考察期间,其他任何考察队不得在此进行考察、挖掘或购买收集品。就此问题,我正式告知科哈诺夫斯基,俄德委员会协议仅规定了双方委员会派出考察队的考察范围,不涉及其他考古爱好者根据个人喜好所进行的考察活动,他们可以进入双方考察队界定的考察范围。当然,我们希望这样的工作是在科学研究的范围内进行,同时需要考虑前人已完成的工作。

委员会主席 拉德洛夫
秘书 什杰尔别尔克

译文与德文公函内容一致
1905年2月16日^⑤

俄国委员会认为科哈诺夫斯基的考察活动是个人行为。^⑥拉德洛夫以俄国委员会主席和国际中亚东亚考察协会主席的名义正式告知德国吐鲁番委员会,俄德协议仅规定了双方派出考察队的考察范围,不涉及其他考古爱好者根据个人喜好所进行的考察活动,他们可以进入双方考察队界定的考察范围。俄方没有破坏双方协议。从勒柯克给德国皇家博物馆管理总局的信中可以看出,勒柯克根本不听拉德

洛夫的解释,依旧认定俄国学者先破坏了双方协定:

奥登堡及其同事将吐鲁番作为德国委员会的活动范围,俄国委员会答应今后策划的考察活动中理应不再插手吐鲁番考察事务。他们不应在我刚一离开圣彼得堡就令俄国驻乌鲁木齐(吐鲁番附近)工作人员从我眼皮子底下“挽救”手稿,他们认为这些手稿应该是俄国科学院的,应该保存在他们的博物馆。科哈诺夫斯基一定会全力完成俄国上级授予的任务。^⑦

在勒柯克看来,科哈诺夫斯基受俄国委员会指派到吐鲁番考察。尽管俄国委员会向德方说明科哈诺夫斯基不是他们派出的考古学家,对双方协议一无所知,俄德“友好关系”的“裂痕”已无法修补。勒柯克单方面认为俄德协议已经失效,并准备在当格伦威德尔抵达后到库车附近考察。1905年3月2日,格伦威德尔给老师库伦的信中表示不会向俄方提供吐鲁番考察所得资料。“德国考察队不要向俄国学者、包括拉德洛夫本人提供考察队所得文献资料。尽管德国吐鲁番委员会答应了这些条件。”^⑧格伦威德尔在下面这封信中的观点更可以说明问题。“拉德洛夫在玩火,我无论如何都不会把文献和照片交给他。”^⑨格伦威德尔对奥登堡也作了深入研究。当他发现奥登堡有了官职,会被行政事务缠身无暇规划新疆考察时,连连拍手叫好。“奥登堡是皇家科学院的秘书长,这非常好,他的时间会被很多行政工作占用,无暇顾及其他工作。”^⑩此时德国人已经做好和俄国委员会决裂的准备了。

(二)勒柯克考察队进入库车周边奇里什,标志着俄德冲突的加剧

勒柯克到库车附近的奇里什考察加剧了俄德双方矛盾。奇里什(Кириш, Kirish),也有学者将其误译为“克利什”^⑪,殆指奇里什郭勒,岑仲勉考证为“(西)百里”,在今新疆库车县东北,“在库车东北六十里,正北当天山正干阿勒坦呼苏南麓,距库车城一百里。”^⑫德国吐鲁番考察委员会认为可以不用征得任何人同意到库车周边考察,理由是“协议中没有提到奇里什,(德国)不排除到库车周边启动考察的计划。”显然,奥登堡和俄国委员会成员并不这样认为。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保存着1905年8月26日奥登堡给

格伦威德尔的官函(第15号),2014年,德国学者在国内公布了这份档案。^①2020年,俄罗斯科学院档案馆布哈林院士将档案内容译为俄文,2021年底,笔者有幸拿到俄文译文档案,现公布如下:

尊敬的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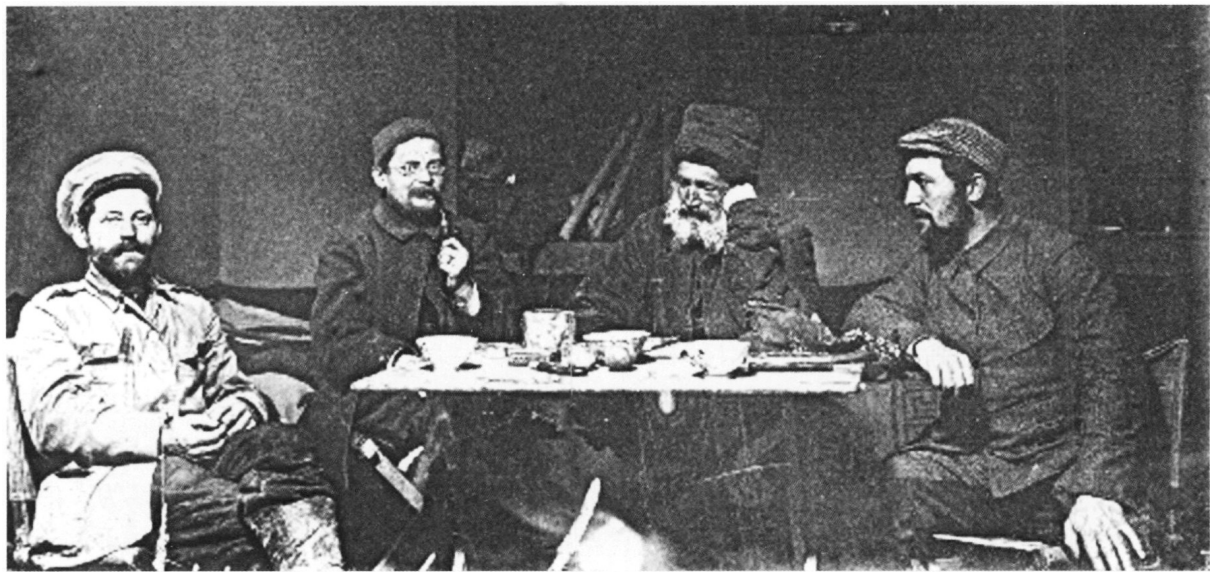
去年,我们就已确定去库车考察,对库车以北的那些不知名的古代废墟进行仔细研究(详见俄国委员会公报上的报告),我理应与克莱门茨、格里戈里耶夫、别氏仔细探讨这件事。昨天我们就如下问题达成一致:“如果贵方也想到这些地方考察并为柏林博物馆收集壁画等珍品,我们也非常高兴并欢迎。还会有什么人会像你们这样做,科学研究对你们而言一无是处,科学研究对你们而言毫无意义。那么,别氏届时也可以到其他地方考察。

向所有人问好

奥登堡^②期待您的回复!

这份档案信中明确指出,如果德国人坚持到库车周边考察,那么别氏也可能调整考察范围,进入吐鲁番进行考察。这封信标志俄德合作就此瓦解。1905年11月2日,别氏从圣彼得堡出发,2月6日到达库车。别氏的库车考察(1906年2月至1907年12月)和德国格伦威德尔的第三次考察(1905年12月至

1907年6月)时间基本吻合(图一)。1906年1月,德国人在库车以南25~30公里的村落挖掘,^③1906年5月1日,德国考察队返回库车,当天去了奇里什。^④德国人在奇里什的挖掘引起了别氏的强烈反对,但在德国人面前还是保持了平和心态,^⑤而勒柯克却说事件发展到使用军火的地步。^⑥格伦威德尔在考察过程中将库木吐喇纳入考察范围,笔者在奥登堡与格伦威德尔信札中没有找到俄国委员会允许德国普鲁士吐鲁番委员会在库木吐喇考察的档案资料。格伦威德尔给别氏的信中声称将考察范围拓展到克里什、库木吐喇和克孜尔是拉德洛夫口头同意过的。^⑦这似乎又说不通。从行政区划而言,库木吐喇和奇里什属于库车县,克孜尔属于阿克苏拜城县管辖。从地理位置角度,库车周边不止格伦威德尔提到的三地。如果拉德洛夫同意德国人在三地考察,他定会与俄国委员会成员商议并在会议纪要中明确“库车郊区”的范围。遗憾的是,格伦威德尔与拉德洛夫的部分信札(1905年4月24日至1909年2月16日)遗失,无法复原二人之间交流的细节。从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保存的《奥登堡、克莱门茨、维谢列夫斯基的考察方案》^⑧中可以看出,库木吐喇和克孜尔西北方向的奇里什早已在德国人计划之中,格伦威德尔在谈判中有意避而不谈,玩起了文字游戏,引起了俄



图一 别列佐夫斯基和格伦威德尔考察队在库车

(照片现存于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档案馆,档案编号:СПбФ АРАН.Ф.208. Оп.3.Л.720.Л.1-1 об,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档案馆馆长伊琳娜·弗拉基米罗夫娜·图金娜院士提供。照片中人物从左至右依次是巴图斯、格伦威德尔、别列佐夫斯基、波尔特。)

国人的强烈反感。1907年,格伦威德尔结束第三次吐鲁番考察后只好改经印度返回柏林。^⑧

俄德委员会的冲突长达四年(1905-1909)。1908年6月11日,谢尔巴茨基给奥登堡的信中还在辱骂德国考察队的无耻,不遵守双方既定协议。^⑨拉德洛夫和格伦威德尔的关系直到1909年才恢复。勒柯克与奥登堡的关系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恢复。1913年,勒柯克在没有取得北京签证的条件下,持喀什噶尔地方签发的证件冒险行至库车。缺少了俄国外交部的帮助,德国吐鲁番考察队第四次考察仓皇结束。

四、结语

通过上面对俄德委员会冲突的细节梳理,我们可以做以下几点小结。

第一,俄德委员会的冲突和冷战长达四年(1905-1909)。冲突的根本原因是俄德两国国家利益冲突。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保存的格伦威德尔第三次吐鲁番考察方案内容指出,库车丰富的收集品是决定在此展开考察的唯一原因,格伦威德尔早就把库车考察放在1906年吐鲁番考察的计划之列。俄德合作只是骗取经俄属中亚入境和通行支援的幌子。尽管奥登堡建立新疆研究的国际合作机制的提议得到欧洲国家的赞同,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遵守协议。20世纪初的政治局势和国家利益实际上阻碍了这种合作的实现。

第二,俄德从合作迅速发展到了冲突标志着俄国建立吐鲁番研究国际合作协调机制愿望的落空。格伦威德尔的书信证明德国人自始至终把俄国人当竞争对手,而不是合作伙伴。以格伦威德尔为代表的德国吐鲁番委员会一方面用花言巧语赢得俄方信任,另一方面却在加快吐鲁番考察准备进程,赶在俄国考察队之前抵达吐鲁番。笔者不认同“德国在佛教美术和古典语言学方面的优势”^⑩使俄国迫切接近格伦威德尔的说法。从格伦威德尔和拉德洛夫、奥登堡的书信往来中可以明显看出,信中更多表现为格伦威德尔向拉德洛夫和奥登堡请教佛教相关问题。

第三,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格伦威德尔还是奥登堡的考察活动,都是对我国文化遗产的盗窃行为。从考察成果来看,德国考察队获利远远大于俄国考察队。在奥登堡考察队到达之前,德国已先后完

成了三次大规模吐鲁番考察,德国考察队将500余箱收集品运往德国柏林,其中包括大量精美的壁画,对柏孜克里克等古代遗迹的破坏力度和文物的掠夺也是始料未及。而此后俄国委员会支持的奥登堡考察队虽获取近20000件手稿,但绝大多数为残片,壁画也多为临摹品。究其原因,是两国探险队所持理念差异。勒柯克疯狂掠夺壁画佛像以丰富欧洲博物馆馆藏,奥登堡则尽量遵循文物保护原则,“清理了散落在洞窟地面的手稿残片”,这些手稿残片记录了百年前中国新疆和敦煌文物古迹的状态和风貌。

(感谢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档案馆馆长 И. В. Тункина 院士提供珍贵的外文史料及在论文修改过程中给予的指导。)

注释:

① Dreyer C. *Die Expedition der Russen auf der Seidenstrasse// Triumphe* 2008. pp. 179-187. Dreyer C. *Russian Archaeological Explorations in Chinese Turkestan on the Turn of the 19th Century// Indo-Asiatische Zeitschrift* 2008. pp.62-71.

② Ермекебай Ж.А. *Поездка Ч. Ч.Валиханова в Восточный Туркестан// Вестник Том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13. №372. с. 101-105.

③ Dreyer C. *Die Expedition der Russen auf der Seidenstrasse*. pp 179-188; pp 62-71.

④ Северцов Н. А. *Поездка в западную часть Небесного хребта(Тянь-Шаня)или Цунь-Линь древних китайцев от западных пределов Заилийского края до Ташкента(с г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картой и разрезами)дополнение к статье Н. А. Северцова: Поездка в западную часть Небесного хребта//ЗИРГО*. 1867. 1. с. 75-181.

⑤ Пржевальский Н. М. *Монголия и страна тангутов. Трехлетнее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 Восточной Нагорной Азии Н. Пржевальского, Подполковника Генерального штаба,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го члена Рус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Т. I. СПб. 1875; Т. II; СПб. 1876.

⑥ Пржевальский Н. М. *От Кульджи за Тянь-Шань и на Лоб-нор в 1876 и 1877 гг.//Известия РГО*. 1878. X III. с. 195-329.

⑦ Пржевальский Н. М. *Третье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 Центральную Азию. Из Зайсана через Хами в Тибет и на верховья Жёлтой реки*. СПб. 1883. Пржевальский Н. М. *Четвертое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От Кяхты на истоки Желтой рек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северной окраины Тибета и путь через Лоб-Нор по бассейну Тарима*. СПб. 1888.

⑧Роборовский В. И.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 Восточный Тянь-Шань и в Нань-Шань. М: Географгиз. 1949.

⑨Потанин Г. Н. Очерки Северо-Западной Монголии. Результаты путешествия, исполненного в 1876–1877 годах по поручению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Рус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членом-сотрудником Г. Н. Потаниным. Вып. I. Дневник путешествия и материалы для физической географии и топографии Северо-Западной Монголии. Вып. II. СПб. 1881.

⑩Потанин Г. Н. Тангутско-Тибетская окраина Китая и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Монголия.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Г. Н. Потанина. 1884–1886. Т. I–II. СПб: Импр. Рус. геогр. о-во. 1893.

⑪Потанин Г. Н. Очерк путешествия в Сы-чуань и на восточную окраину Тибета в 1892–1893 годах //ИИРГО. 1899. XXXV. с. 363–436.

⑫Обручев В. А.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Северный Китай и Наньшань. Отчёт путешествия, совершённого по поручению РГО в 1892–1894 гг. Т. I. Путевые дневники, касающиеся Восточной Монголии, провинций Чжили. Шань-си, Шень-си и Гань-су, Ордоса, Алашаня и Восточного Нань-шаня. СПб. 1900. Т. II. Путевые дневники, касающиеся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Монголии, Джунгарии и горных систем Бей-шаня, Нань-шаня, Восточного Тянь-шаня и Цзинь-лин-шаня. СПб. 1901.

⑬Певцов М. В. Путевые очерки Чжунгарии //ЗСО ИРГО. 1879. с. 1–140.

⑭Козлов П. К. По Монголии до границ Тибета (Монголия и Кам. Труды экспедиции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Рус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совершённой в 1899–1901 гг. под руководством П. К. Козлова. Т. I. Часть первая. СПб. 1905. Кам и обратный путь. СПб. 1906.

⑮Громбчевский Б. Л. Доклад капитана Б. Л. Громбчевского о путешествии в 1889–1890 гг. (Читано в экстренном собрании И. Р. Г. О. 10 января 1891 года. С отчетною картою // ИИРГО. 1891. XXXVII. с. 98–119.

⑯罗曾(1849–1908年), 俄国东方学家、阿拉伯学家。曾担任圣彼得堡科学院亚洲博物馆馆长(1881–1882年), 俄国皇家考古协会东方部主任(1885–1908年), 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主任(1893–1902年), 1901年当选圣彼得堡科学院院士。

⑰Ольденбург С. Ф. Экспедиция Д. А. Клеменца в Турфан в 1898 году. Иркутск: Известия Восточно-Сибирского филиала ИРГО. 1917. Т. 45. с. 2.

⑱Под общ. ред. М. Д. Бухарин. Эпистолярн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архив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и Турфанского собрания. Москва: 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2018. с. 25.

⑲Под общ. ред. М. Д. Бухарин. Эпистолярн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архив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и Турфанского собрания. с. 26.

⑳Протоколы Восточного Отделения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Русского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ЗВОРАО. 1900. с. 34.

㉑Протоколы Восточного Отделения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Русского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ЗВОРАО. 1903. с. 7–9; 1905. с. 10–12; 1906. с. 30–32; 1907. с. 17–18; с. 9–17.

㉒皮歇尔·理查德(Pischel, Richard; 1849–1908), 德国东方学家, 德国吐鲁番委员会主席。

㉓时任俄国财政部部长谢尔盖·尤里耶维奇·维特(Сергей Юльевич Витте), 在任时间: 1892–1903年。

㉔阿芙古斯杰申指俄国大公康斯坦金·康斯坦金诺维奇·罗曼诺夫(Константин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Романов, 1858–1915), 1889年, 罗曼诺夫任彼得堡皇家科学院主席。

㉕Д. Е. Мишин, Сидоров М. А. и др. Переписка В. Р. Розена и С. Ф. Ольденбурга (1887–1907). с. 335; с. 343; с. 351; с. 354.

㉖原件存于德国柏林艺术博物馆, 档案编号: Turfan-Akten. 7609–7611.

㉗Ольденбург С. Ф.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памятников старинных культур Китайского Туркестана. I. Южная часть Китайского Туркестана с. 368–369.

㉘А. Грюнведел. Отчёт об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м исследовании Турфана и его окрестностей. //Известия РКИСВА. 1903. No. 3. с. 17–24.

㉙H. Walravens. Briefwechsel und Dokumente //Wiesbaden Asien-und Afrika-Studien der Humboldt-Universität zu Berlin. p. 48.

㉚H. Walravens. Briefwechsel und Dokumente. p. 48.

㉛H. Walravens. Briefwechsel und Dokumente. p. 51.

㉜以下简称杜丁。

㉝H. Walravens. Briefwechsel und Dokumente. p. 53.

㉞以下简称“别氏”。

㉟H. Walravens. Briefwechsel und Dokumente. p. 56.

㊱Grünwedel A. Bericht über archäologische Arbeiten in Idikutschari und Umgebung im Winter 1902–1903 //Abhandlungen der Königlichen Bayer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 Kl. 1906–1909.

㊲Под общ. ред. М. Д. Бухарин. Эпистолярн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архив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и Турфанского собрания. с. 459.

㊳Whitfield S. Aurel Stein on the Silk Road. L. 2004. p. 170.

㊴德|高杏佛文; 陆平, 王宁译: 《德国吐鲁番探险队持有的中国旅行许可文书原件研究》,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第106页。文档现存于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吐鲁番探险档案(1899.9.23–1903.12.31), 档案编号: I.B.38. pp.101–102.

㊵Под общ. ред. М. Д. Бухарин. Эпистолярн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архив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и Турфанского собрания. с. 35.

㊶Протоколы Восточного Отделения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Русского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ЗВОРАО. 1903. с. 1–8.

⑫档案现存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东方部,档案编号:АВ ИВР РАН. Ф. 43. Оп. 2. Д. 47. Л. 1-2.

⑬原件现存于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档案馆,档案编号:СПбФ АРАН. Ф. 148. Оп. 1. Д. 6. Л. 11.

⑭ *Протоколы Восточного Отделения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Русского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ЗВОРАО. 1903. с. 1-4.

⑮Под общ. ред. М. Д. Бухарин. *Эпистолярн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архив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и Турфанского собрания.* с. 435.

⑯ Смирнов А. С. *Археология и военная разведка. Из истории подготовки экспедиции П. Пеллио и К. Г. Манне-грейма в Китай*//Восточный архив. 2012. № 25. с. 28-36.

⑰陆庆夫等:《中外著名敦煌学家评传》,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242页。

⑱Под общ. ред. М. Д. Бухарин. *Эпистолярн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архив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и Турфанского собрания.* с. 433.

⑲原件保存于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档案馆,档案编号:СПбФ АРАН. Ф. 177. Оп. 2. Д. 88. Л. 10-11 об.

⑳Под общ. ред. М. Д. Бухарин. *Эпистолярн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архив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и Турфанского собрания.* с. 436.

㉑ *Протоколы Восточного Отделения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Русского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ЗВОРАО. 1904. с. 9-14.

㉒原件保存于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档案馆,档案编号:СПбФ АРАН. Ф. 177. Оп. 2. Д. 88. Л. 22.

㉓ Dreyer C. *Abenteuer Seidenstrasse. Die Berliner Turfan-Expeditionen 1902-1914.* Lpz. 2015.

㉔原件保存于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档案馆,档案编号:СПбФ АРАН. Ф. 177. Оп. 2. Д. 88. Л. 21-22 об.

㉕ Н. Walravens. *Briefwechsel und Dokumente.* p. 56.

㉖原件保存于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档案编号:Turfan-Akten. 1022-1026.

㉗Под общ. ред. М. Д. Бухарин. *Эпистолярн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архив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и Турфанского собрания.* с. 38.

㉘ *Протоколы Восточного Отделения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Русского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ЗВОРАО. 1900. с. 16-20.

㉙Под общ. ред. М. Д. Бухарин. *Эпистолярн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архив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и Турфанского собрания.* с. 38.

㉚原件保存于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档案馆,档案编号:СПбФ АРАН. Ф. 208. Оп. 3. Д. 269. Л. 15-16.

㉛科哈诺夫斯基收集品中的文物部分保存在埃米尔塔什国家博物馆,手稿部分保存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

㉜原件保存于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档案编号:Turfan-Akten 5703.

㉝有学者研究表明科哈诺夫斯基的考察活动正是在俄国委员会的授权和指令下进行,详见:ВоробьеваДесятковская М. И. *Рукопная книга в культуре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в домусульманский период*//Рукописная книга в культуре народов Востока. М: Наука. 1988. с. 314.

㉞Под общ. ред. М. Д. Бухарин. *Эпистолярн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архив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и Турфанского собрания.* с. 615-620.

㉟ Н. Walravens. *Briefwechsel und Dokumente*//Н. Walravens. pp. 59.

㊱ Н. Walravens. *Briefwechsel und Dokumente*//Н. Walravens. pp. 61.

㊲Под общ. ред. М. Д. Бухарин. *Эпистолярн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архив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и Турфанского собрания.* с. 41.

㊳陈海涛:《德国皇家吐鲁番考察队综述》,《西北史地》1997年第1期,第74页。

㊴[清]穆彰阿等修:《嘉庆重修一统志》卷524第33册,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第26170~26171页。

㊵ Strauch I. *Priority and Exclusiveness: Russians and Germans at the Northern Silk Road.* //Études des lettres. 2014. 2-3. L'Orientalisme des marges: éclairages à partir de l'Inde et de la Russie/Ph. Bornet. S: Gor-sheshenina. pp. 175-176.

㊶档案现存于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档案编号:Turfan-Akten. 1296-1298.

㊷Под общ. ред. М. Д. Бухарин. *Эпистолярн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архив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и Турфанского собрания.* с. 59.

㊸Березовский М. М. *Экспедиция М. М. Березовского*(1905-1907гг).档案现存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档案编号:АВ ИВР РАН. Ф. 59. Оп. 1. Д. 14. Л. 1-41.

㊹档案现存于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档案馆,档案编号:СПбФ АРАН. Ф. 208. Оп. 3. Д. 53. Л. 1-17.

㊺ Le Coq A. *Auf Hellas Spuren in Ostturkistan. Berichte und Abhandlungen der II. und III. Deutsche Turfan-Expedition.* Lpz. 1926. p. 109.

㊻档案现存于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档案馆,档案编号:СПбФ АРАН. Ф. 208. Оп. 3. Д. 720. Л. 2-2 об.

㊼现存于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档案编号:Turfan-Akten 0958-0960.

㊽乌鲁木齐领事科洛洛夫至奥登堡的信函(1906年10月16日),现存于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档案馆,档案编号:СПбФ АРАН. Ф. 208. Оп. 3. Д. 280. Л. 1-1 об.

㊾ Витасин А. А. *Переписка Ф. И. Щербатского с С. Ф. Ольденбургом*//Изучение Индии в России(очерки и материалы). М. 2008. с. 273-444.

㊿张重洲:《德国探险队与清末吐鲁番社会——以第二次、第三次考察为中心》,《丝绸之路》2016年第16期,第18页。